

书人茶话

它们或许无用,却又如此美好

——谈一些近期出版的博物学读物

李涛

辛稼轩晚年有一阙《贺新郎》云：“惠子焉知濠梁乐，望桐江、千丈高台好。烟雨外，几鱼鸟。”人就是这般，老去方知万事空，富春江上，雨雾钓台，鱼鸟之恋是多么的美好啊。而春天，翻阅一些博物学的闲书，也是一件或许无用，却很美好的事。

从无用的杂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质来

近期出版的《野草：野性之美》是其中之一。50种世界各地的野草，风吹哪页读哪页，先抢那些熟悉的名字看：牛蒡、雏菊、大叶醉鱼草、苦苣菜、原拉拉拉、蓝铃花、野芝麻、虎杖、婆婆纳、野豌豆，手绘博物画插图有130余张之多，文字倒是简略，对需要了解更多野草知识的读者，略有不足，不要紧，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有一本妙不可言的《杂草的故事》，前几年有了中文版，你可以找来读。

这两种关于杂草的书都来自英国，我们中国也有一本小书不可忽略，即周建人著《田野的杂草》，这是三联书店1949年6月出版的，为“新中国百科小丛书”之一，小32开，只有70页。全书分为“引言”“春季常见的杂草”“野草的生命”“夏季常见的杂草”“花的构造及与外界的关系”“到了秋天”“在冬季里”“结束的几句话”八个部分。作者的用意，“是拿自生在田边、路旁、河畔等处，平时看作不大有用处的草类来讲，使读者对于那些草认识得更明白些……可能会从无用的杂草里找出有用的性质来呢”。

寒斋所藏为1950年4月第三版，已经印到一万册。这本小书后来似乎未再版，十年前偶然发现被收入《花鸟虫鱼及其他——周建人科学小品选读》一书，书中还有周氏其他40余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他在博物学方面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博物学著作极为丰富，尽管与后来诞生于西方的博物学不完全一致，但自有其体系。大名鼎鼎的《本草纲目》，其内容涉及了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知识，可谓是一部博物学



图：疆千里光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野生动物。选自《野草：野性之美》

著作。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是叙述自然即动物、植物和矿物的种类、分布、性质和生态等的最古学科之一，博物学家是“对博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专家的尊称”。在我看来，他们不仅博学，更是一些勇敢的人，他们生产出无数今天已成为常识，甚至妇孺皆知的知识，然而，这一行当在今天却似已步入黄昏。

既可格物致知，也可托物言志

无用的博物学，因了一些有眼光的出版家的推动，不时出现在新书讯息中，校罗的《野果》、溼泽龙彦的《花逍遥》、卡拉纳皮的《本草：李时珍与近代早期中国博物学的转向》、范发迪的《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诸书，令读者爱不释手。

去年读到两种新书《植物名释札记》《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系谱述》，

一本讨论中国植物通俗名称的来龙去脉，一本深入厘清有宋一代植物谱系的发展脉络，都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前者为已故的夏纬瑛先生耗尽毕生心血完成，在中国典籍中，植物的同物异名、同名异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夏先生认为：“一个植物名称本身，就反映着在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先人对这种植物的认识程度。”数十年中，他遍翻古籍，行万里路，直到晚年因双目失明，无法继续。比如“牡丹”，他注意到，历来医书均未释名，他通过辨析指出，“‘牡丹’者，以其根皮之赤丹而为名，‘牡’字无义。”值得一提的是，夏先生的植物名称辨析，不唯从语言学出发，是在大量的植物调查基础上进行的，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植物名释札记》笔记式行文风格不同，《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系谱述》是一部厚重的专著，作者久保辉幸是在中国工作的一位日本学

者，他注意到植物谱系这一类专著在宋代的大量出现，但已有的一些研究多停留于古代科技成就方面，他的研究更多关注这些谱系的作者的人生经历与时代背景，阐明这一类出版物的兴盛与当时社会的关系，读来饶有兴味。据作者的调查，宋代花谱中，有牡丹谱15部、芍药谱四部、菊花谱八部、梅花谱四部、兰花谱和海棠谱各二部，玉蕊花谱和琼花谱各一部，以及综合性花谱四部，此外尚有经济植物谱系26部，但动物谱系仅有区区四部。在对这些谱系进行文献学考察后，作者发现，北宋时期作者的思维明显带有“格物致知”的学术精神，而南宋时期作者则更倾向于以种植行为表现其隐遁的生活态度。这一点，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一书中“牡丹的诱惑：有关植物的写作以及花卉的美”一章亦有相关论述，尽管二者的研究取向不同，但可以参照阅读。



《野草·野性之美》
[英]加雷思·理查兹著
光合作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与花方作谱——宋代植物谱系谱述》
[日]久保辉幸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植物名释札记》
夏纬瑛 夏经林 著
中华书局出版



《香港方物志》
叶灵凤 著
余婉霖 绘
商务印书馆出版



《游隼》
[英]A. 贝克 著
李斯本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博物学给予一个普通读者的帮助与欣喜

以上中日学者的两本著作，都是需要潜心多年，甚至需要一种不计实用的态度方可成就，其成果亦可资学术领域之外的普通植物爱好者阅读，但现实中，常有一种跨界的博物学写作作者，他们的著作另有其有趣之处，比如叶灵凤。

叶灵凤的《香港方物志》1958年在香港中华书局初版，收入作者在1953年间陆续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112篇短文。叶氏在“前记”中说：

我将当地的鸟兽虫鱼和若干掌故知识，运用自己的一点贫弱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民俗学知识，将它们与祖国方面和这有关的种种配合起来。

翻看目录，“香港的香”“一月的野花”“新蝉第一声”“海参的故事”“香港的野鸟”“香港的蜘蛛”“水仙花的传奇”，看了这些标题就明了书的内容。查《叶灵凤日记》：1952年12月25日 约了高雄夫妇及《大公报》的刘允如夫妇来吃晚饭……允如约为《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写一关于香港草木虫鱼的连载。

1953年1月21日 自元旦起，开始在《大公报》的“大公园”写《太平山方物志》，记本港的鸟兽虫鱼和人情风俗，每天约一千字。

1953年1月23日 写《太平山方物志》，自今年元旦开始，每天写一篇，已写了二十多篇了。只是这题目是不能长期写下去的。

1953年2月3日 写《太平山方物志》。就要过旧历年了，又要准备一些过年风俗的资料。

据《叶灵凤日记》可知，《香港方物志》中的短文，最初发表时总题为《太平山方物志》，署名“南村”。叶灵凤当时每日要写4000字，有时一天写了6000字，其中就包括了这《太平山方物志》，因此他曾担心不能持续，不仅是精力，更多的是博物学材料的储备。多年前读过香港南粤出版社所出叶灵凤《花木虫鱼漫谈》，惊讶于这位当年“创造社小伙伴”的知识渊博，读了

《香港方物志》则又对其背井离乡后的生活多了些了解。在日记中，他曾慨叹某一类文章“写得太多了，也觉得索然无趣”。但稿费一到，女儿已等着上街买新大衣了。卖文为生之不易，于此可见矣。无用的博物学，却可为潦倒文人之生计。

“今年立春早，不仅红棉开了，就是杜鹃也开了。”叶灵凤在日记中写道。很快，几乎同样的句子出现在他的《英雄树木棉》一文中。每天不是爬格子就是匆匆往来自于报馆与寓所，叶氏的生活远不如那些著名的博物学家轻松自在。

英国人约翰·亚力克·贝克，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位作家，他一生只写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名为《游隼》，几年前介绍到中国，数次重印。据说作者一生都生活在英格兰东部一个乡下小镇，本书是他十年间追寻游隼的笔记，他的原则是：

我尝试将一切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保存下来：鸟、观测者，以及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我描述的每一件事都发生在观测当下，但我并不认为忠实的观察和记录就足够了。观测者的情感与行为也同样重要的数据，我必如实记载。

作者的笔触精致而宁静，有诗意。四野寂静无声，迷雾之中，万物朦胧而神秘。一阵冷风吹过，云层堆叠了整片天空。麻雀踩过落叶的树篱，沙沙窸窣，如小雨纷纷。欧鸟鸣叫嚷起来。寒鸦和乌鸦站在树枝上窥探下方。我知道，游隼就在这片田野中，但我就是找不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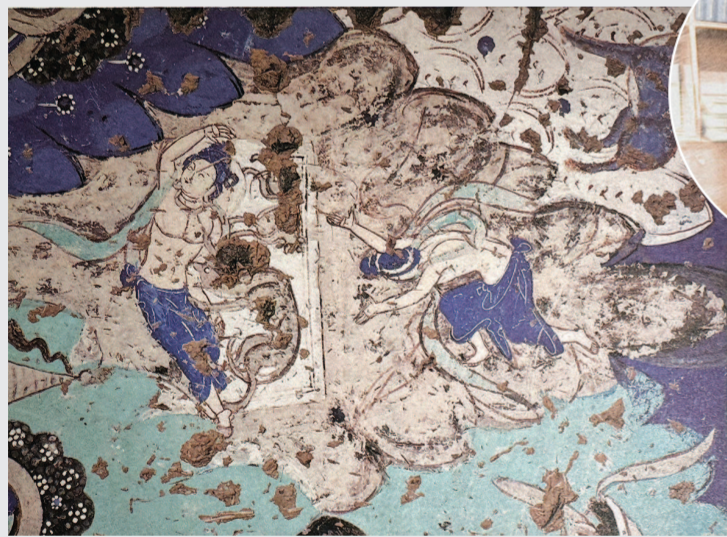
他观察游隼的追逐、捕杀、进食、休憩，沉迷期间，物我两忘。研究者指出，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英国，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得游隼的数量急剧减少，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游隼乃至人类自身的挽歌。

我注意到近年国内也有作者将注意力集中到类似的领域，尽管在当下大学的学科分类中，没有博物学的位置，但“博物”一词却日渐传播开来。我本人的专业离博物学很远，关于这个话题，理应由更有资格的专家来讨论，我只是从博物学的边上，分享一些它给予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的欣喜与惬意。

在 读

在西域石窟中领略美与未知

杨 早



克孜尔第三十八窟本生故事画《舍身饲虎图》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石窟之美：走进西域》
宁强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池田大作在《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一书中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我曾经问过博士本人：‘您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他面带笑容地回答说，他希望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这句话流传甚广，刘东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初版序言转述时讹为“公元9世纪”，同时说自己更愿意活在10世纪的宋朝汴京。结果以讹传讹，很多文章说汤因比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将来会不会有别的说法，让汤因比活在别的朝代，也很难说。

从知识角度出发，我们当然明白汤因比选择的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的新疆，是东西方文明初次大交汇的时空。这一空间当时被称为“西域”，定义是“敦煌以西，直到帕米尔高原以东”，与今日新疆重合。而广义的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可以向西一直延伸到意大利罗马。中原与西域的边界，则始终是在敦煌这个枢纽。投笔从戎的班超班定远，晚年上书朝廷道：“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就代表了敦煌这样一个连通西域的起点与终点。

因此，这一时期的西域文明，“交汇”应当是独一无二的关键词。那是汤因比想穿越身处的，也是我们今日研读时应当重视的。

更容易将敦煌理解为起点，就像司马迁说张骞通西域是“凿空”，就是去开拓一个空如也的空间。问题是，西域从来也不是“空如也”，只是从其中中原角度来看，它代表着未知的广袤大地。与中原文明交汇的其他文明，西域、匈奴、吐蕃以至大秦等等，文字资料都不如中原文明丰富，这也是养成中原习惯性视角的重要原因。

因此，如果想获得更全面更立体的交汇视角，实物如石窟、造像、文物，就显得格外重要。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宁强的团队，十多年来八次对新疆境内石窟遗迹考察调研，制作出名为“西域·敦煌艺术发现之旅”的艺术公开课，又将公开课内容整理成文，修订结集为这本《中国石窟之美：走进西域》。

既然是“课改书”，也就有课改书固有的利弊。比如有些故事、有些信息会反复出现，这在公开课里不是问题，可以加深观众或听众的理解，但改成书之后，多少会令人重复冗余之感。但是有弊就有利。这本书的利，首先在于将作者丰富的知识与行迹“拆”得好，我们对于一个陌生的时空的理解，其实都是碎片化、渐进式的，从对西域的地域、人口、人物的总体介绍，再到龟兹、精绝诸古国，克孜尔、库木吐喇、森木塞姆、阿艾诸石窟的详细描述，本书是通过许多小问题的分析来渐次达成的（当然也是课程需要，一

节课只有10来分钟）。更重要的是，虽然在全书编排是按从东往西的考察路线记录描述，但具体到“石窟之美”，作者应该是有意要逆反我们从中原一步步走向未知西域的思维定式，而是回到石窟本身的演变史，因为“佛教开窟造像是由西向东沿着丝绸之路往中国内地走的”，所以本书首先，也是重点介绍的克孜尔石窟，就是中国境内最早、也是最西端的大型佛教石窟。“克孜尔石窟直接影响了敦煌石窟中最早的一批洞窟，而这批洞窟又影响到内地的云冈、龙门这些石窟的开窟”。因此此书对克孜尔石窟的描述最为细致，看完书我最想去的，也是这个中国石窟的源头。

从克孜尔到敦煌，也最能看出当年的石窟造像者，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相反，他们像《中国石窟之美》的作者一样看重对受众的贴合度。以克孜尔石窟中的《舍身饲虎图》与莫高窟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相比，后者的精细程度要高得多，考虑到两者建造者本身的传承，就不能说是工作态度或成本差异造成的，作者认为，这是受众定位不同造成的新选择。敦煌的洞窟针对大众，而克孜尔石窟则面对小众。克孜尔石窟的受众主要是僧人，因此图画简单，点到为止，莫高窟的受众是一般的信徒，因此精细而复杂。西域一西一东两群石窟的定位，

也可以看出佛教东传的一种叙事策略。从印度到克孜尔再到敦煌，对女性裸体的画法，同样印证了这一点。

另一个例证是石窟造像对“孝”的态度。印度佛教无论大乘还是小乘，并不讲孝道，儿子出家后，父母反过来要跪拜礼敬他。中土多次排佛灭佛，“不孝”也是主要罪名之一。然而克孜尔石窟里出现了《太子本生》这种强调孝子得救的故事，比如敦煌北周时期出现的《太子本生》要早。再加上《弥兰因不孝出海遭难受报》这样的同类故事，我们可以推断出在佛教东传过程中，西域已经出现了孝道的渗透与改写。这种发现有有助于我们重新认知佛教东传的变异历程。

书中这样的小谜团与猜想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还有个与当地特色结合的例子：吉木萨尔西大寺壁画上有着成群结队的女子画像，何以如此？作者的解释是此地作为军事要塞，士兵战死甚多，遗下的孤寡妇女抱团生活，这些画像也是一大群无依无靠的姐妹共同追求未来美好天堂的心灵渴求。

不少公开课会犯一个毛病，即追求斩钉截铁的结论，不然似乎不算得权威。其实历史的有趣很多时候就在于未知与不确定。《中国石窟之美》的一大好处是没有强作解人，它只是点出这种图像叙事或风格的重要性，留下了大量可以延伸探讨的空间。还是以“交汇”论，相距不远的库木吐喇石窟与阿艾石窟壁画都受到明显的唐朝文化影响，但在最早的克孜尔石窟却绝少见到唐风。作者坦承对此种现象他也没有结论，但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的是：军事占领、行政管理与政治统治，是否就意味着可以占满所有文化空间？唐朝占领了龟兹，并没有取消龟兹的国王与政府，跟王家关系密切的克孜尔石窟，是否会在这种占领与反占领的文化博弈中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类似状况，这是完全可能的。结论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探索与发现来证实，而对历史的疑窦与思辨，却是阅读中的莫大兴趣所在。

读《中国石窟之美》，首先的感受当然是“美”，用笔墨无法形容出那些穿越千载的色彩、线条与风格带给读者的冲击，心里就一句话：让我去现场观摩吧！实用性与历史感去震撼我吧！然而，在美之外，更能让阅读回味无穷的，是那些散落在字里行间的“未知”，它提醒着我们这个时空的浩渺与神秘，也让人忍不住同时空因比的答案，能见证文明的交汇与再生，才是最圆满的人生。

三味书屋

在刘文飞看来，“读与被读”是一件与生俱来的事情，是一桩相伴终生的事业。他的新著《读与被读》打破语言牢笼，在汲取与表达中寻找完美的平衡，在对话与交流中觅得生活的美好，在限制与突破中实现心灵的富有。

众所周知，作者完成一部书并不意味着创作过程的结束，而只有当该作品被读者阅读之后，其方才完成一个完整生命历程。如此一来，“读与被读”也可以被视作一次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的旅行。《读与被读》一书就以《荷马史诗》为起点，以《洛塔塔》为终点，全程访问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乔伊斯、川端康成、纳博科夫等11位世界文学大师，期间或钻研人物形象，或探讨文学属性，或谈论思想、生存等严肃话题，或从建筑、颜色等细节解剖经典，最终奉上一场世界经典文学的思想盛宴。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位莎士比亚的读者都可以成为部分的莎士比亚，同时又可以超越莎士比亚。刘文飞是一位颇具洞察力的阅读者，他依靠对文本一遍遍的细读，发现了许多细节之趣。例如安娜发现了卡列宁的大耳朵，托尔斯泰发现了安娜的发现，纳博科夫又发现了托尔斯泰的发现。于是，读者跟着刘文飞发现并记住了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这个著名的细节。这种套娃式的阅读发现，不仅是字里行间的魅力，也是精读文字的奖赏。而这样的字斟句酌似乎也只有在提醒读者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双眼，也可以手持放大镜，甚至还可以架起高倍显微镜。

除了精读，刘文飞也指出了又一条阅读的路：写作者的高度，是由他的阅读量来决定的；同理可得，阅读者的深度，也是需要依靠他的阅读量来支撑。譬如在《尤利西斯》面世前后，欧美文学中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许多意识流文学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对于主人公“地下室人”的潜意识的传导，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于安娜出轨之前心理活动的描写，又如雷翁的《彼得堡》、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作者与读者的交替努力，共同汇成一道波澜壮阔的意识流文学潮流。再如为了读懂《雪国》的死亡主题，读者需要了解川端康成其他小说《禽兽》《千只鹤》《名人》《睡美人》《山音》等作品中描述的死亡，需要了解川端康成在未成年时先后送别了父亲、母亲、奶奶、姐姐、爷爷以及他的几位老师、远亲和朋友这样的个人经历，需要了解川端康成的自杀，需要了解日本文化和文学中的“物哀”传统，甚至要了解女主人公驹子的名字与中国古代的蚕马神话之间的联系。

作为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也时刻警醒自己——要提防那只是读一本书的人。于是，他开始以俄罗斯文学名著为支点，去撬动世界文学名著的杠杆。譬如文学中所谓“双重人”的说法，最早源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于1846年的中篇小说《双重人》；而在《哈姆雷特》这出戏中，哈姆雷特这个形象身上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性格的双重性。再如，荷马在他的两部史诗中对战争与战争中的英雄所

打破牢笼，汲取新知

郑从彦



《读与被读：世界文学名著十一讲》
刘文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持的情感立场，构成了悲悯传统的源头，同时这种“悲悯”深远地影响着俄罗斯文学，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中主人公格里尼奥夫是一名志于沙皇的军官军官，可他却因帮助过起义军首领普加乔夫而得到后者的宽恕；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绘俄国民军战胜拿破仑的辉煌胜利，可他却要借助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形象来表达他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博爱思想；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对军官格里高利及其命运的同情也构成了这部史诗巨著的情感基础。

读是一种吸收，被读是一种释放。可是有的时候，读也是一种释放，因为读什么、如何读，已然构成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减缓甚至消弭生活的重担，可以获得前进的动力，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有的时候，被读也是一种吸收，因为对用心的作者而言，他们十分在意读者的阅读感受，他们乐意倾听读者的阅读意见，他们迫切希望让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再上一层楼。聪明的他们深知他们吸收的是弥足珍贵的阅读财富。